

那时候一个剧本4000元,是了不起的一大笔钱了。《红高粱》的版权费拿到800元,我非常兴奋,在当时,这是一个人好几个月的工资(按:影片1988年上映)。

电影上映后引发的热潮,超出了我的想象,估计也超出了张艺谋他们的想象。为什么会反响这么大?

我觉得,每一部文学作品都有它自己的命运。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,时代主题是解放思想、冲破束缚,所以像《红高粱》里所张扬的个性、强烈的反封建思想,应该是引发广大观众和读者共鸣的原因。

像电影里粗犷豪放的插曲《妹妹你大胆向前走》——现在的年轻人不会喜欢这种风格了——但当时,几乎人人都会唱,人人都在唱。所以一部文艺作品,跟它的时代一定是密切相关的。

后来我也写过电视剧,在“总参”(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)工作的时候写过反映中国军人“军体五项”获世界冠军的电视剧,转业后写过检察题

材的《红树林》,抗战题材的《哥哥们的青春往事》。

真正写话剧是1997年从部队转业后,广州军区的作家王树增先生约我为空军话剧团写一个话剧《霸王别姬》,后来搬上了舞台,吴京安和肖雄主演。2002年,肖雄因为这个戏获得了“梅花奖”。这个戏去过非洲、德国、东南亚演出,我也跟着去看过。前不久,北京人艺还重排了这个戏。

然后,我又写了《我们的荆轲》,也是给空军话剧团写的。因为《霸王别姬》之后,他们很受鼓舞,就希望我能写三个历史戏,《我们的荆轲》就是第二个,不过写完后,这个戏就搁浅了。

2011年,北京人艺的张和平院长找到我,要把这个戏搬上舞台,导演是任鸣。我把剧本做了修改,有了很大程度的提高,演出后反映很好,我还因此得了话剧金狮奖的编剧奖。

现在这个戏是北京人艺的保留剧目,每年都会拿出来演,还去过俄罗斯、法国演出,下个月还将去塞尔维亚。

3

获诺奖之后,我首先发表的作品是2017年在《人民文学》发表的戏曲剧本《锦衣》。

《锦衣》是根据一个民间故事写的,我写的时候当然希望能排成京剧。上海京剧团的尚长荣老先生看了剧本,表示喜欢,但要搬上舞台,还需要一段时间。

2018年发表了一个戏曲剧本《高粱酒》,根据《红高粱家族》这部小说的素材改编。总之,写戏曲剧本,我感觉还是很过瘾,童年时的梦想正逐步实现。而且《锦衣》写的是我家乡的传说,里面用了一些家乡方言。

今年春节,我给国家大剧院写了歌剧剧本《红高粱》,在戏曲剧本《高粱酒》的基础上做了很大修改,从戏曲到歌剧,篇幅、人物关系,改了5稿之后,我慢慢悟到了歌剧剧本写作的一些规律。这个过程很艰难,也很愉快。

「鳄鱼是一种隐喻,就是人的欲望。它不仅仅是一个贪官的话题,也是关于人的,人类确实应该克制欲望。」



莫言在家中接受记者采访 敖彬伟 朱杰 摄



莫言获春分白金图书奖后发表感言 敖彬伟 朱杰 摄

4

我们这代人,从上世纪80年代起接触西方文学,其中包括戏剧文学。比如萨特、易卜生、斯特林堡、尤金·奥尼尔等人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品,后来又读了贝克特、布莱希特、迪伦马特等带有荒诞色彩的剧本。传统写法、批判现实主义写法当然震撼人心,但也正因为他们达到了一个相当高的高度,逼着后来的剧作家另辟蹊径。

这跟小说一样,巴尔扎克、托尔斯泰把现实主义推上一个顶峰后,后面的小说家就想要别的办法,所以就有了普鲁斯特、卡夫卡。剧本也一样,任何一种探索都是对舞台的一种拓展,对戏剧本身的一种拓展。

像去年获诺奖的挪威剧作家约恩·福瑟,他的剧本在欧洲实际上非常受欢迎。(风格)跟我们人艺的戏完全不一样,我们的戏是群体戏,热闹、贴近生活,福瑟的戏人物非常少,两三个角色,甚至是独角戏,人物的对白极其简单、不断重复。

在这样一种简单和重复中,就产生了一种独特意味,让人产生许许多多的联想。我觉得这就是卡夫卡他们想要着力表现的一种人的处境,或者一种精神状态。

福瑟的剧本我去年也读了几部,觉得真是非常有意思。看起来很简单,但是越想越复杂。

话剧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后进入中国的艺术门类。中国以前只有戏曲,各地有自己的地方戏,话剧被带来中国后,从一开始就与革命密切相关,街头性、即兴性很强,比如抗战时期影响深远的《放下你的鞭子》,再后来才有了曹禺、郭沫若、老舍等人的作品。

近年的戏剧舞台非常活跃,官方的剧院和民办的团体都在演,可谓百花齐放。有大胆的尝试,也有稳定的继承,各自都有相对稳定的观众群。

5

《鳄鱼》是我的第三个话剧。

我以现实主义为底子,然后添加超现实的元素。《鳄鱼》就是这样的结构,基本上还是现实主义的,但也是象征性、超现实的,因为现实中没有这样的事。

前年春节,我动笔写《鳄鱼》。这个贪腐题材的剧本,讲外逃美国的贪官单无惮在海外的

生活,素材来自我在《检察日报》工作的积累。

有一次我在法国出差,半夜睡不着,突发奇想,如果把那些贪官放在国外的环境中,他会干什么?不懂外语的他们,心情如何?日常生活怎么安排?看什么电视,看什么书?慢慢构思起这个故事。

鳄鱼是一个重要的象征,这个灵感是我从一个邻居小伙子那里学习的。当时他养宠物,蜥蜴、变色龙一类的爬行动物,他了解鳄鱼的习性。

他跟我讲,如果把鳄鱼放在一个很小的空间里,比如放在一个一米的鱼缸里,是不会长大的,哪怕养10年它也就那么长;但一旦把鱼缸变成三米、四米,它立刻就成长开了。我觉得这一自然现象充满了象征意义,就像欲望,你不对它进行限制,它就会膨胀。

如果没有鳄鱼这个隐喻,这个故事就非常一般。鳄鱼成为整个剧本的一个核心,是一个隐喻,就是人的欲望。人实际上是被欲望左右的生物,但有的人自控能力好,控制在一个合理的范围之内。

当然没有欲望也就没有人类,古代“存天理、灭人欲”是一个极端,新文化运动解放人的思想、肯定人的正当欲望,把压抑的合理欲望解放出来,让人获得自由,让人的生命力得到恢复,创造力随之迸发。但一旦超出了范围,就走向另一个极端。

克制自身欲望,把欲望这只鳄鱼关进笼子,靠的是道德和法律。我想,它不仅仅是一个贪官的话题,也是关于人的,关于男人也是关于女人的,带有某种象征意味的舞台作品。

当然,首先它也是一个文学作品。我希望有的人读到这本书能有所警觉,也希望广大读者读了有所感悟。在写作过程中,我觉得人确实是一种非常复杂也非常美妙,值得不断研究、不断自我认知的生物。为了我们生活得更好,为了我们的后代生活得更好,人类确实应该克制欲望。这是我写这本书时非常浅显的一点感触。

小说和戏剧,是两种艺术门类,但本质上都是写人的,都是塑造典型人物,也都是讲故事的。

我还会继续写剧本,下一部作品大概方向是历史题材,一个家乡的故事。《鳄鱼》写了一个在遥远的美国的事情,下一部作品就写一个家乡的故事。

(注:话剧《鳄鱼》正在创排中,将于5月开启巡演。赵文瑄、张凯丽、邓萃雯领衔主演,杭州站已开始售票。)